

〔日〕 池 田 诚 编 著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译校

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

抗日战争 ——与—— 中国民众

—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

社

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

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

〔日〕池田 诚 编著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 译校

求 实 出 版 社

编 著 者：〔日〕池田 诚等

译 者：杜世伟 梁作新

审 校：李良志 郭景兴

武月星 刘建业

责任编辑：冯世平

封面设计：李贺然

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

——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

〔日〕池田 诚 编著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 译校

求实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 8.625印张 210千字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622册

ISBN 7-80033-085-X / D·31

定价：3.20元

目 录

中译本前言	李良志 (1)
前 言	(14)
总 论 世界现代史上的抗日战争	池田 诚 (17)
一 最近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动态	(18)
二 现代世界的基本结构与抗日战争	(24)
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侧面与抗日战争	(28)
四 中国近、现代史上的抗日战争——“国 家的统一”与“人民的统一”	(30)
第一编 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抗战的形成	(35)
第一章 概论	(37)
体现中国民族主义的抗日救亡论	西村成雄 (37)
一 “九·一八”之后——“扩大战争的计划”与 中国的民族主义	(37)
二 中国政治的主题——抗日救亡	(38)
三 通往抗日民主的道路	(42)
第二章 东北的殖民地化与抗日救亡运动	西村成雄 (45)
一 东北的殖民地化与中国的民族主义	(45)
二 反抗殖民地化——救亡运动的展开	(48)
三 统一战线的形成与东北抗日联军	(53)
第三章 国民政府的“安内攘外”政策及其 破产	石岛纪之 (62)
一 “安内攘外”论的形成	(62)

DA1176/08

二 “剿共”与亲日政策的推行	(66)
三 抗日运动的高涨与“安内攘外”政策的破产	(71)
四 抗日的民族主义与“安内攘外”政策	(76)

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

的确立	田中 仁 (80)
一 苏维埃革命路线与反日问题	(80)
二 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转变	(86)
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确立	(91)

第五章 抗日民众运动的开展及其思想 水羽信男 (95) |

一 抗日救亡民众运动的开始	(95)
二 抗日救亡民众运动的开展	(99)
三 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	(110)

第二编 全民抗战的开展 (113) |

第六章 概论 (115) |

全面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

安井三吉 (115)

一 卢沟桥事件的历史地位	(115)
二 日本的侵略	(117)
三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	(119)
四 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战争	(122)

第七章 国民政府“抗战建国”路线的施行 菊池一隆 (124) |

一 重庆政府向内地抗战体制的转化	(124)
二 重庆政府抗战体制的确立与施行	(128)
三 重庆政府的中央集权化政策与民主化的斗争	(135)

第八章 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 井上久士 (143) |

一 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	(143)
二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	(148)
三 抗日根据地与民主主义	(156)

第九章 日军占领区的“清乡”与抗战 古厩忠夫 (161) |

一 汪政权的性质与“清乡”	(161)
二 “清乡”	(163)

三	“清乡”与国民党、忠救军·····	(167)
四	“清乡”与新四军·····	(168)
五	新四军的复兴·····	(172)
六	汪政权与“清乡”的破产·····	(176)
第十章	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·····安井三吉	(181)
一	复杂的倾向·····	(181)
二	内蒙古·····	(185)
三	解放区·····	(191)
四	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“区域自治”论·····	(196)
第十一章	日中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·····副岛昭一	(199)
一	日中战争的开始与国际政治·····	(199)
二	欧洲战争与中国·····	(204)
三	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·····	(207)
四	亚洲太平洋战争与日中战争·····	(211)
末 章	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课题·····池田 诚	(216)
一	日中关系史上的抗日战争·····	(216)
二	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抗日战争·····	(220)
	抗日战争史年表·····	(227)

中译本前言

李良志

1987年7月7日，是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，中日两国人民，为了纪念那一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，分别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。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长池田 诚教授，为了纪念这次事变，将研究会历年讨论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学术成果，责成十多位专家教授撰写成专题，汇集成书——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。这是日本学者对抗日战争的最好纪念，也是献给中国人民的最珍贵礼物。书中凝结着对战争中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的深刻同情和支持，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掠夺，则进行了揭露和批判。这本书的主题正如书名，主要是阐述由日本侵略战争所激起的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，但著作广泛的涉及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文化及国际关系，视野广阔，论述精辟。尤为可贵的是，著作批判了日本学术界对抗日战争的一些错误观点，对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理论和实践、以及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，都能作出客观、公正的评价，实事求是这本著作的显著特征。这部著作在中国的出版，交流了中日两国史学工作者研究抗日战争的成果，对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、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、反对侵略战争，无疑都是极为重要的。

下面，我仅就本书的几个主要问题，作一些介绍和述评。

一 侵略与反侵略是日中 战争的根本性质

日本帝国主义从发动“九·一八事变”，到1945年8月战败投降，战争延续15年之久。在这场战争中，中国无辜人民伤亡2000余万，财产损失约600亿美元，这是中国人民在外国侵略者所燃起的战火中，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中日两国人民，全世界人民，都表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谴责；可是非常奇怪的是，近年来日本当局的个别人，还有某些日本学者，竟想为日本的侵略开脱罪责，以至根本颠倒战争的性质。他们说，日本并没有侵略中国，几十万、上百万的日军，从日本本土开到中国，从关外杀到关内，从华北杀到华东、华中、华南，血洗半个中国，只是什么“进驻”，给中国造成了“麻烦”，震惊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，完全是“虚构”；率领20万军队从上海杀到南京，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松井石根，竟成了“无限热爱中国，始终以实现日中和平为己任”，“最用心维护军纪”，“对中国人的关怀确是无微不至的”、“早晚诵读观音经”的“圣将”。去年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，日本又有人提出：事变是“中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”，中国军队“先打第一枪”，日军不仅是“自卫”，而且也无扩大战争之意，日军在中国驻军、演习，是根据条约所赋予的“权利”，因此无可非议。更有甚者，有人还把日本的侵华战争，美化为“奉行孙文主义”，渴望“实现孙中山的遗志”，是根据“大亚细亚主义”“追求亚洲各民族的解放”。持这种侵略有理、侵略有功偏见的人，还责怪中国过去“安处于传统世界中，虚度时光，才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走上了向中国开拓殖民地的道路。”我们无须再列举这些颠倒是非、荒诞无耻的言论了。出现在日本报刊上的这些言论，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

民的感情，使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惨杀中国人民的情景，一幕一幕地再现在我们的回忆中，永无消失的可能。

我们深深感激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的各位史学家，他们挺身而出，仗义执言，旗帜鲜明地驳斥了上述谬论。请看他们的论述吧！

“日中战争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“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性质是反抗日本侵略的反帝民族解放战争。”

抗日战争的反侵略包括三个方面：“1、民族解放；2、拥护民主主义体制；3、维护社会主义。三者的共同敌人是法西斯和军国主义。”

“战争的受害程度很难用数字准确地表达出来，特别是搞清日军在日中战争中的暴行确实非常困难，这是因为历届日本政府漠不关心，而且力图隐瞒侵略真相，甚至加以美化。”

“当然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，这无法用数字和文字表达的伤痕深深地烙在中国大地和人民心中。”

“陈毅副总理曾说：往事（指抗日战争）如水，就让它流吧！”，“但我们作为日本人，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是负有责任的，这点无法忘记，不能象水那样流过去。”（本书作者安井三吉引用陈毅与龟井胜一郎的一次谈话）

以上仅是从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中所摘录的有关战

争性质的几段话。全书各章，还从日本侵华的15年历史过程及不同的侧面（如对东北的侵略、在华中的“清乡”等），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。有的作者还指名道姓的谴责了《南京大屠杀之虚构》一书的作者、军国主义分子余孽田中正明“篡改史料”，批评某些翻案语言“使人如同再次听到了战争时期日本政府的声明。”总之，谴责侵略，象一条红线串贯本书的始终，是本书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。

我的家乡在洞庭湖畔，我多次亲眼看见侵略者在我的鱼米之乡是怎样烧杀淫掠的，我自己还曾被侵略军追赶，险遭不测。作为一个亲身感受日本侵华战争苦难的人，当看到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谴责侵略、同情中国人民的诚挚语言，不禁热泪盈眶，深为敬佩。是的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“深深烙在中国大地和人民心中”，它不能“象水那样流过去”，无影无踪。中日两国人民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，我们要向前看，惟希望这段历史象东逝的流水永不复返，两国人民今后世代和睦相处，共建友谊和文明的大厦。

二 维护民族的独立和统一，争取民族解放，是抗日战争的思想基础

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一书中说：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。日本敢于欺负我们，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。克服了这一缺点，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，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，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，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。”^① 中国共产党遵循这个道理，经过曲折的道路，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

^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一卷本，第478—479页。

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伟大、最广泛的联合，果真把全民族力量集聚起来，前仆后继，同仇敌忾，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

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，以大量的篇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曲折过程和重大意义，作了详细阐述，其中特别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基础，作了深入探讨，使我们很受启发。

日本史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解，在书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称之为“中国的民族主义”，但他们十分清楚地解释，这种民族主义，既不是反动的种族主义，也不是单纯的灭洋排外，而是为了维护“民族独立”和“民族统一”，争取民族解放；因此，既使在皖南事变中，它也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渡过难关，避免分裂，它是“维系统一的根源”，是“抗日战争坚持到底的关键”。日本史学家认为，抗战时期，是“中国民族主义”的升华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觉醒，它以极大的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成为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。

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，对“中国民族主义”还作了具体分析，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各阶级、阶层、各党派的民族主义，既有共性，又存在原则区别。作者着重分析和对比了国共两党的“民族主义”，指出国民党的“民族主义”，要求第一步实现“国家的统一”，第二步才是抗日，把统一看成抗日的前提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，既使在“七·七”事变后的八年抗战中，国民党也未完全放弃这一政策，因而反共磨擦不断出现。作者认为共产党的“民族主义”，要求以“人民的统一”来抗日救亡，它是“民众的民族主义”、“全民的民族主义”，是“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”，是坚持15年抗战的“深厚思想基础”，“是19世纪中叶以来‘救亡图存’思想的结晶。”作者还认为，共产党的“民族主义”的另一特征是“民主主义”，它同

抗战时期的民主化进程相一致，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，才有全民的抗日。为此，中共在抗战中要求国家民主化，并率先在解放区实行了彻底的民主，使解放区的民族抗战“最为活跃，最吸引群众，组成为抗战主要力量的实验场。”作者指出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，虽然也实行了一定的民主，却死抱着“训政”不放，坚持一党专政，因而两种“民族主义”导致两种结果：国民党的“民族主义”在吸引民众、并把它纳入国家统一的具体过程中，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；而中共的“全民的民族主义”将广大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，在实现人民统一的过程中使之具体化，最后取得了胜利，并成为战后“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”。

我们中国史学工作者并不把抗日战争的思想基础归结为“民族主义”，但由于日本学者在这本书中所说的“民族主义”实际是我中华民族、炎黄子孙自古以来就竭力维护的民族独立、统一和尊严，它实质上是爱国主义，因此用“民族主义”一词，也未尝不可。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清楚地向日本人民讲述了一个重要真理：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，他们珍视各国人民的独立，也更愿为保卫自己的独立而献身。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和感谢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，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整个中华民族空前巩固的团结起来，把中华民族为维护独立和尊严的英勇斗争精神空前的发扬光大，中华民族受屈辱的时代已永远成为过去。我们确信，我国民族有能力、也一定将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。

三 国共两党都对抗战 胜利作出了贡献

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，对国共两党的抗战理论、政策、实践，均作了客观的、实事求是的评价，使人们能较全面的了解中国抗战史，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著作对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以及为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所作的不懈努力；作了高度评价，认为这表明中共是最忠诚和最坚定的爱国者。但著作也没有忽视中共在实践统战过程中的曲折和错误，没有把中共说成一贯正确。日本学者认为，中国共产党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对中国的主要政治课题是抗日救亡，曾一度严重认识不够，把保卫苏联和推翻国民党政权当成了主要任务，完全脱离了中国的斗争实际。著作认为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，经历了从苏维埃革命路线到抗日民族解放路线的过程；从最初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联合，发展到以后的全民族的联合；在政权问题上，则经历了从工农共和国、到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的过程。著作对中共在抗战时期把民族斗争和民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，予以高度评价，并认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最终形成，不是八一宣言，也不是瓦窑堡会议，而是1937年5月的苏区全国代表会议，会上毛泽东所作报告是其标志。因为，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全面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而且阐述了抗日与争取民主的关系。日本学者认为，民主政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保证，因此中共的这一方针，促进了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民主改革，使国共关系也较为密切。后来，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的斗争越来越冲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，为国民党所反对，遂成为战争胜利前夜国共矛盾和斗争的焦点。其最后结果是共产党争取了全国人民的支持，巩固的团结了民主党派，统一战线更为强大，国民党则陷于孤立和被动。日本学者如此深刻地阐述中共争取民主方针的战略意义，使我们深受启发和教益。

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，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、特征、性质以及中共的各项政策，都有详细的介绍和评述。认为这些地区既不同于苏维埃时期的根据地，也不同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，它在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，

财政上受其接济，但又是中共领导的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，执行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方针；认为根据地的这种两重性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必然结果。著作对根据地的民主政权评价很高，认为共产党在这里真正实现了抗日与民主，是“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”，中共并指望通过这个途径实现“新的国家的统一”。

本书作者收集大量资料，对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作了研究，赞赏中共的“休养生息，培养民力”、“合理负担”、“精兵简政”、“自力更生”等等方针，在政治上加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，在经济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，使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封锁和摧残下，渡过了难关，并为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。

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，对延安整风运动既有肯定，也有批评。认为整风在树立权威方面“达到了个人崇拜的程度”。对整风过程中的“抢救运动”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，认为那种扩大化的过火斗争，说明边区的民主制度尚存在“脆弱”的一面。日本学者深为惋惜地说：中共对“这一边区的特殊经验，不仅没有批判地总结其历史局限性，而且加以美化，以致酿成无产阶级‘文化大革命’这样的悲剧。”

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，对国民党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进行了严厉批评，指出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，建立法西斯的“兵营国家”，它“本质上带有浓厚的反共反人民色彩”，是“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理论基础”，也反映了国民党对国际援助的依赖性。因此，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制定的军事战略战术，必然是消极防御的阵地战、消耗战，以拖延时间，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。作者进一步指出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为绝大多数人所反对，因而它不能成为指导中国人民抗日的理论，必然被中共的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“民众的民族主义的呼声完全吞没。”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，就意

味着‘安内攘外’政策的破产。”但日本学者认为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是国民党“民族主义”的抗日论，它并非根本拒绝抗日，只是强调当时的时机、条件尚不具备，抗日“非现实性”。华北事变后，国民党仍执行这一政策，但已积极准备抗日了。中国学者认为这样的分析，也是很有启发性的。

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，对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，也作了客观的、实事求是的评述。抗战爆发后一年多的时间，日军占领了近半个中国，东南沿海最发达的地区、几乎所有的交通要道，除重庆、西安、昆明以外的所有大城市，都被日军占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国民党要维持二、三百万军队坚持抗战，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行政机构和几亿人民的生计，没有一个有效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是不行的。在这方面，我们过去的现代史、革命史、党史，都毫无例外地对国民党持根本否定态度，没有什么肯定。但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不这样看，认为国民党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。如战争开始后，把银行和许多工厂迁往大后方；在西南、西北12个省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；为发展工矿企业建立了资源委员会，扶助“工合”运动；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，在土地政策方面实行“征实”、“征借”，税收方面实行印花税、所得税、遗产税；在金融方面也进行改革，实行中央集权制，实现国库的统一管理，发行公债等等。作者指出，国民党的这些政策和措施，一方面加剧了人民的负担，有些还带有“掠夺性”（如田赋）；但是，它的确维持了战时供应，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，使军民坚持了斗争。著作说，8年中，中国的工业生产力持续增长，常规武器也能基本自给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我们认为，日本学者的这些评述是客观求实的。人所共知，蒋介石在战争中确有依赖外援的思想，但他真正争取到的外援并不多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美国以租借形式援助盟国的物资，累积总值约460亿美元，其中英国得3026400万美元，占美国全部援助

的3/5；苏联得98亿美元；法国得140300万美元；蒋介石国民政府才获得63100万美元，仅占英国所得援助的2.08%，也不及苏联所得的零头。这就是说，中国的抗战，基本上是靠自己。因此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财政经济政策作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，不搞简单的否定，是十分必要的。日本学者说：“从抗日的角度看，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，不是失败，而是成功。”书中例举了大量统计资料，极为可贵。

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，对1939年后国民政府 in 政治思想方面的反共反民主政策、以及太平洋战争后“同日军作战相对消极”，“以50万大军包围边区”，1943年7月又进攻关中地区等，持严厉批评态度。但著作对国民党的总的评价是：蒋介石究竟不同于汪精卫，他的政府在抗战中没有崩溃，并坚持到了最后胜利。

四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

如何正确评价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and 作用，在战后各国史学界有很大分歧。欧美、苏联等国出版的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，均无视中国这个战场开辟最早、坚持时间最长、所作牺牲最大、有效地支援了反法西斯各国等事实，说什么中国的抗战不仅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场，甚至在亚洲也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，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劳、日本的战败，完全归之于苏美，特别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对东北出兵。在日本，也有一些史学者，认为日本是被美、苏打败，“非负于中国”。

《抗日战争与民众》一书，驳斥了上述观点。指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从“总体来看，它的主要方面是由日、德、意三国同

盟发动的帝国主义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”，中国的反法西斯、反军国主义的战争，从1931年柳条沟事件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结束，长达15年之久，所作牺牲和损失难以用文字和数字来表达。

为了具体说明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，著作在不同章节中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的大会战，分别作了详细介绍和肯定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，则专有一章作介绍。作者没有从武器决定论，从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、战争的现代化水平来评价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，而是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，民族的觉醒，从“全民的”、“民众的”战争特征，来评价中国抗战的作用。这就是使日本百万侵略军深深地陷入中国战场 这片泥沼不能自拔，其兵力和财力急剧消耗，以至难以为继。据统计，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后，全国总兵力为24个师团，其中派到中国的有21个师团，仅以3个师团据守本土和朝鲜。1938年7月，侵华日军增加到30个师团另4个独立混成旅团，据守本土和朝鲜的，仍为3个师团。1939年秋，日本总兵力为40个师团另19个独立混成旅团，其中侵华日本为25个师团另19个独立混成旅团（不包括在东北的关东军）。太平洋战争爆发时，日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，其中38个师团另22个独立混成旅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。1945年日本投降时，日军在华兵力为108万人，超过其他任何战区的日军投降人数。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，在侵华战争中，日军伤亡共133万人，也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其他各战区伤亡之首。这就是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区，始终拖住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，并使之遭致了最大损失，这就极大的支援了反法西斯各国的反侵略战争。

《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》一书，对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的抗战既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北进、又推迟和制约它的南进的说法，提出了新的见解。认为中国的抗战，不是推迟了日军南进，而是